

## 精英思維主導 傳統經濟箝制 香港人才戰略困局

「當前人力資本狀況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遠遠未能滿足經濟轉型所需。」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該院近日發布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裏為香港敲響警鐘。

蔡洪濱筆下的「經濟轉型」，是指香港應該轉型至「以高端專業服務業為支柱，並由知識型創新驅動的新經濟」。在「知識型創新經濟」中，高技術、高知識的人才核心生產力，而坐擁優質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源的香港，人力資本水平本應很有競爭力，但為何會被詬病為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教育投入與人才產出之間如何錯位，才導致香港的經濟遲遲不能轉型，甚至屢失龍頭地位，只能搖頭興嘆？

有人把人力資本的滯後歸咎於學校未能作育英才；然而，只要將鏡頭對準香港青年，便可發現問題源於整個教育系統長期受困於兩道枷鎖：精英思維模式和傳統經濟結構。《香港01》與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李曉迎及一眾香港創業青年對話，冀能深入解構「人才荒」，為「經濟轉型」鋪路。

### 1. 精英思維窒礙人盡其才

香港長期被定義為「經濟城市」，香港人則是「經濟動物」，所以衡量「人才」的唯一指標便是經濟收入的多少，而金融、地產、專業服務等比較發達的經濟支柱就是「人才」集中行業。正是這種狹隘的人才視角，養成了「只見樹木」的精英思維，不但忽略了社會本來就由不同才能的人組成的事實，而且不斷透過資源的傾斜扼殺人們貢獻社會的機會，最終扭曲了人才與社會的關係，導致人才淪為生產活動的奴隸，使得經濟變得庸俗、浮躁、單一。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重要系統，偏偏這套系統早就深陷片面「精英主義」的泥沼。首先，香港教育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1%，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其次，面對資源的緊絀，均等教育的機會被不斷壓縮—在高等教育方面，學額資助相當有限，導致公立院校苦苦糾纏於數字遊戲，難以提高人才培育效率，私立院校則受入學門檻和政策束縛，未能發揮市場力量；至於基礎教育，官立、津貼、直資、私立這四大學校分類背後又代表着四種截然不同的教育資源分配邏輯，結果往往造成結構不公，尤其經常忽視基層成才的權利，令他們難以透過教育上流，遑論為社會貢獻才智。

因此，若要做到「人盡其才」，特區政府必須重新梳理教育和人才的關係，繼而徹底改變教育政策的思維模式，而首當其衝的是大學教育。正如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所撰《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所指，在

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中，大學教育應以「普及」為目的，無奈香港的大學教育至今仍然沿用傳統經濟下的教育模式，以少數精英而非大眾作為收生對象。

## 追逐排名「必要之惡」

面積僅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擁有五間全球排名百大的大學，經常為政府和市民津津樂道。不過，香港大學前校長、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之卻不以為然：「大學排名，多是數字遊戲。有些數字講出來簡直笑死人。」他接着和記者分享了任職港大校長時的一件趣事，「有一年，香港大學的排名竟然高過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因為有關排名其中一個評核標準是「非本地職員得分」，而位於美國的史丹福大學自然有不少當地學者，但香港大學卻有大量外聘學者，結果竟憑該項得分超過史丹福，「笑到口都大晒！」

成也「排名」，敗也「排名」。特區政府高舉「精英主義」，令「排名」被異化為教育資源調配的標準，導致公立院校從學位名額、學科內容到學術研究都被迫捲入「數字漩渦」，而1965年成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就是主導這套追逐「排名」的資源分配制度的「罪魁禍首」。徐立之直言，教資會對公立院校的評判標準「好畸形」：「內地是有學科排名的，比如北京大學的文科好過理工科，而清華大學的工科又好過它的文科，但我們香港就不是！（而是）一視同仁，用文章數字等方法去評價大學的研究水平，而且評出來（的結果）是整間大學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學生、撥款。」

徐立之形容，盲目追逐大學排名已然成為香港人才培育的「必要之惡」，因為排名的高低影響招生的優劣和資源的多少，老師和學生只好追着排名走，但排得高不代表教和學好。「排名主要看研究，不是看教育。」徐立之一再為我們釐清「排名」的迷思，強調學校排名高是因為研究好，研究好則是源於國際知名的大教授比較多，研究生通常會跟着大教授，但本科生未必如此，而大教授打分也相對嚴謹，又「嚇怕」了本科生。

知名度主導了大教授，大教授主導了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主導了學校排名，學校排名又主導了資源和生源的分配，這正好展示出精英思維之下「資源投放」和「教育產出」之間的層層錯位——大資源跟着大教授。若在傳統經濟時代，這套「優勝劣汰」的分配制度或許還能派上用場，畢竟大教授對舊經濟的研究相對成熟；但當新經濟異軍突起，新學者都還在適應和探索當中，大教授更難及時轉型，結果，新興學科往往不受重視，遑論培育創科人才。

為什麼一個僅由24名海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的教資會就足以定奪全港八間公立大學的資源分配？蔡洪濱在《建議》中指出，因高等教育管理制度「過於行政主導」，而大學辦學自主權力太小，八大院校只能在同一考核指標架構下進行獲取公帑資助的同質競爭，根本未能按社會需要和自身特點發揮個別優勢；另外，「高等教育投入過於依賴僵硬的規劃和公式，資源調配墨守成規，無法適應時代變化。」

## 私校未能發揮作用

計及八大直接受教資會資助的院校，連同私立院校，全港共有22所可以頒授學位的高等院校；按理說，只是收取教資會極少補助的私立院校，理應能夠擺脫「精英主義」的行政干預，但實際上，它們也很難做到「辦學自主」，就更別說要為社會培育多元人才。

早於2010年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成為認可專上學院、至兩年前獲升格的**香港恒生大學**，是全港最為知名而資源也最充足的私立大學，卻也面對重重障礙。先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澳門大學，現為**恒生大學**校長的何順文直言，明明自資院校的學科通通經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嚴格審核，全都具備國際水平，可是，社會至今普遍仍對自資院校存在誤解；更令他灰心的是，連特區政府也戴着「有色眼鏡」看待私立院校，不但未曾主動擔當澄清角色，好好解釋自資院校的認可資歷，甚至跟隨社會認定自資院校質素參差的偏見，加強學位頒授的監管。

何順文所言的「加強監管」，是指教育局早前表示全盤接納「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於2018年發表的報告意見，更新自資專上院校頒授學位的申請機制。以**恒生大學**為例，原有機制下，大學開辦學位課程前，先要經過校內學院委員會和教務委員會的審批，再逐級提交至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教育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等部門審核；但在新機制下，教育局的審視工作將提早於評審局進行學術評審之前進行，當中會就相關行業或界別的人力需求徵詢決策部門，參考院校的培訓策略、學術計劃、專精範疇，了解類近課程的市場供求，比較擬議課程的特色和優劣，再向院校提供意見。何順文擔心，教育局和評審局的工作有所重複，可能拖慢整個評審進度至少兩年，不利於開展新興課程；另一方面，若由政府決定學校開辦科目，而當局只由GDP或行業需求思考學科建設，有違教育理念。

以業界意見來指導自資院校的學科課程，恐會加深香港產業結構固化的問題。何順文上任**恒生大學**校長後，一直推崇博雅教育，希望做到「文理兼備」。恒大近年也開辦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新穎課程，如2015年開辦的「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2019年開辦的「文化及創意創業（榮譽）文學士」、2020年開辦的「藝術設計學士」等。「不限於開設市場需要的學科，私立大學才能補充、平衡到公校。」何順文嘆道，恒大的學士課程大多瞄準新興產業，可助香港朝多元產業轉型，但如果以教育局現時的「業界需求」來審視，大多都需「回爐重造」，因為香港人力市場最高薪、最短缺的永遠是商科和專業科。

「年輕人應有不同的理想和志趣。有些人需早些『搵食』，有些人卻未必需要。」何順文坦言，「學生成為哲學家或文學家，我都很高興。最重要是他能否找到滿足感、能否創造價值。」為此，他最近正在籌辦新課程「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學（Philosophy）和經濟（Economics）三科合在一起」，雖不符合政府需求，卻可為社會提供有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多元人才。「香港的本科教育一路走『精英主義』，以政府營運為主。」何順文認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不應只有公立學校。美國、歐洲最好的大學都是私校，美國的私校比例亦高過公校。」他感嘆，私校不用公帑辦學，而用市場力量提供學額，本是一件好事，「但由於政府操控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根本沒有發揮民間的資本與力量」，並不健康。

## 人才產出效率低下

大學生產潛能被壓抑，無法培育更多人才；坊間卻埋怨學位過多，造成「學歷貶值」。「大學教育的最終目標，應是任何人想讀大學就可讀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表示，如果將大學教育當作基本教育，那種認為學位應該「貴精不貴多」的說法就會不攻自破；他強調，「大學教育其實真的很基礎。譬如要投票，如果連基本的政治理念都聽不懂，那怎麼投？」可惜，以精英思維主導的教育系統當中，大學教育僅屬「聰明人」的資源，而非基本教育權利，故港府不願提高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又立下嚴苛的入學門檻，極大地削弱高等教育普及性和人才培育的效率。

首先是學額問題。教資會自1994/1995學年開始，每年合共為八間公立大學資助1.45萬個第一年學士學位的學額，至2000年稍微提升至1.5萬個，目前佔每年文憑試考生人數不足兩成。然而，「1.5萬個學額」的釐定既沒合理標準，又已落後時代，純粹是港府當年曾以18%適齡學生入讀大學作為目標，即使後來提出六成大專學生比率的目標，但實際增加的資助學額也只有500個；更可笑的是，教育局曾於2008年指出，資助學額的多少要考慮中學學生數量、入學學生質素、政府財政狀況、香港人力需求等因素，但至今仍然未再修訂。

社會上每次提倡增加資助學額，特區政府都會反駁稱，目前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但何順文澄清，有關數據把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內，有「谷數」之嫌，實際上只有約35%學生能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遠低於歐洲和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在他看來，有能力的年輕人應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我們的核心是，有沒有給年輕人足夠機會和資助去完成四年制課程，而不是去爭取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學額。」

何順文所指的35%，已包含資助學額和私立學額。理論上，當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有限，私立院校本應積極擔負提高入學率的職責，正如徐立之憶述，2000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正正希望社會有多些大學生，呼籲私立機構辦學，才有了現時大批的自資院校。但現實是，自資院校的出現雖然令入學率翻了一倍，但仍遠低於六成的目標，到底原因何在呢？徐立之認為，「學額」的深層次癥結，在於入學門檻過高：「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能夠』入大學的學生人數並不足夠。」他把矛頭指向文憑試的「3-3-2-2」門檻（指文憑試考生考獲中文及英文3等、數學及通識2等，可達到大學收生最低門檻）—與公立院校「供不應求」的學額相比，私立院校年年都要為收生煩惱，學位多是「求過於供」，皆因門入學門檻之高，基本上已排拒三分之二考生就讀學士學位的機會。加上學生人數本來就按年大幅遞減，能夠達到入學門檻的考生就少之又少了。

以2013至2019年間的考生與學額統計為例（表一），文憑試考生人數由近7萬跌至4.7萬，成功考取入學門檻的考生人數亦由2.7萬減至1.97萬；然而，當政府資助學額維持在每年1.5萬個，即符合入學資格而未能獲得資助的考生人數已由1.2萬減少至4,700，但自資學士學位學額卻由6,989個增加至9,881個，可見生源競爭十分激烈。例如本港歷史最悠久、以新聞及傳播學系著稱的私立院校珠海學院，近年收生狀況奇差，連續四年實際收生不達預計學額的四分之一。徐立之慨嘆，「自資院校收生時，是『麵包浸水，渣都唔剩』！」

何順文亦同意「3-3-2-2」門檻應予以調整，「對很多國家來講，香港的收生門檻相對較高。好多學生被迫去外地升學，或者『無得揀』下讀副學士。」他建議，政府可適當放寬收生標準，讓私校可以接納更多有體藝天賦、領袖才能的學生，「公校基本上都『睇星星』啦！現時私校容許3%學生不達門檻，我希望可以擴大到10%，令入讀本科的標準更多元化。」

「3-3-2-2」的門檻不止影響自資院校收生，更令中學教育變得「應試化」，造成學生心理疲勞與迷茫。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座講授賀潔婷早前發表獲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資助研究項目《探討香港學生如何築構未來願景》報告，為有關問題斷症：「大部份學生都希望獲得大學文憑，然而，現實情況是本地大學的錄取率僅約兩三成，這意味着只有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才能獲得進大學的入場券。現實和理想的差距讓學生更加感受到來自教育體制的壓力，並形成了心理上的癥結。幾位學生均以『令人窒息』等字眼形容該情況，其中一位更直接指出問題核心：『學校中有太多阻礙學生發展的枷鎖。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接受教育，然後參加工作，那時候他們發現社會強調的反而是創新和突破。』」

在學額限制與門檻限制下，香港一流的教育資源無法有效地轉化為人才產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聯同塔塔通訊（Tata Communications）發表的《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顯示，香港排在全球第27位，排名低過首爾、台北、新加坡和東京。其中，培養人才這項的評分有三個細分，分別為主流大學排名、青年入學率及社會連接度，在排名前30的城市中，香港的主流大學得分排名第四，但青年入學率就只有27.9分，排名墊底（表二）。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2015年的資料，25歲以上成人的人均教育年數，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只有11.6年。蔡洪濱在《建議》中分析「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幾乎所有人都有9至10年義務教育的情況下，這個差距反映的是成年人獲得大學教育的比例」，可見，香港總體教育水平落後於很多OECD成員國。

### 基礎教育基層缺位

在落後的總體教育水平背後，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而且從小學至中學的基礎教育已形成「貧者愈少，富者愈多」的結構困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李曉迎直言，雖然特區政府長期聲言推動基礎教育的普及化，卻依然不能擺脫「精英思維」，「你數一數，楊潤雄局長上任後去過幾次基層學校？不會超過十次！」

香港的小、中學教育系統中有官立、津貼、直資及私立學校，然而，私立學校與普通官津學校之間存在極大資源差異。「國際學校是什麼資源？本地課程又是什麼資源？」李曉迎以他所在的國際學校（屬私校）裏的「飛盤運動」舉例道，「我們學校發現最懂飛盤的是西方人，就請了一幫西方老師來教，學校有錢嘛！那沒錢的學校呢？就只能請香港本地的老師，但根本沒有資源讓他去進修，他也沒有參加比賽，這個差別就非常大了！比如說，我們學校有一年就在飛盤比賽裏拿了全國第二。學校都可以給學生提供飛盤這個東西，但這個東西能不能上升到對他升學有用呢？我的學生去哪裏升學都可以說自己是全中國第二，而你的學校只能拿來做個興趣班。」

私立學校雖好，但學費由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因而基層家庭大多會選擇官立及津貼學校。但是，優質的官津學校對基層亦難言公平。官津學校的收生、派位存在「世襲制度」，亦即有兄姊在校就讀或父母在校任職的學童將有更高的機會入讀名校，這種制度上的精英「保護主義」，令基層很難入讀部份傳統名校。以小一收生為例，官津學校每年入學有約四分之一的學生是「世襲生」，自行收生階段成功獲派學位中有超過一半為「世襲生」（表三）。一些熱門學校由於面向世襲生的自行收生名額供不應求，不得不動用統一派位學額，令普通家庭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大減。以2020年中西區排名第一的聖公會聖彼得小學派位情況為例，今年180人中有120個是「世襲生」，即有三分之二學童是「世襲」入學。

世襲制度令欠缺家世背景的基層進入優質官立學校的機會大減；經濟能力不足的家庭亦很難支持孩子接受直資、私立教育。基層家庭在整個基礎教育系統中尤顯被動。更殘忍的是，被政府所忽視、無法享受公平教育資源的基層孩子其實是香港的多數。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近十年來，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維持在兩成以上，即每五戶有兒童家庭，就有一戶為貧窮家庭。對基層乃至貧窮家庭而言，教育本是他們改變命運的賽道，但不公平的起跑線早已將大部份基層孩子擋在大學門外，他們只能淪為精英及中產家庭的陪跑者。

曾任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的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在其著作《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中，反思教育改革對基層家庭的不公：「教改形成的局面是，弱勢區域及低下階層的高能力學生也處於不利，難於進入英中及較強的中中，而這些中學幾乎壟斷所有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及高增值學系。整體來說，低下階層學生升入政府資助大學的機會大減，若要讀其他專上課程，將要自費承擔。」早在2016年，《香港01》據學生資助處資料發現，在2006至2015，公立院校資助學額雖一直增加，但獲得助學金（須經入息審查）的學生人數及比例卻錄得跌幅。鄭燕祥在書中評價道，「就讀於八大的清貧學生，由2006/07學年每10人中有3.8人，減少至2015/16學年的2.4人」，「清貧學生在公營大學的人數及比率在過去十年不斷減少的現象，只是這派位機制弊病的必然後果，非常不公。」

## 低估應用科目效能

基礎教育的課程設計亦同樣存在問題。應用型教育本是產生科學及技術人才的重要路徑，但在香港卻成了「差生」的標籤。李曉迎說，學科分為應用科和學術科本是「因材施教」，最後卻成了「標籤作用」：「你是學應用科的，說明你學習不好。」他更直言，社會對應用科存在誤解，反問：「學旅遊就是疊被子、端茶倒水嗎？」據考評局數據，2020年中學文憑試中，報考應用學習科目的中學生人數為3,651人，佔比僅有總考生的6.8%。

社會的偏見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政府由上至下對應用科的忽視，導致整個考評制度的斷層，最終令應用科的認受性大減。本港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年報告《應用教育：成就非凡多元出路迎接嶄新數碼時代》中就建議政府應重拾應用教育。報告針對應用課程的低報讀率列出兩大原因：第一，應用科目認受性有限，學術科目考生表現實際可分為七級（一級至五級，五級又設兩個星級），但應用科目最多只有四級，分數上限令學生卻步；第二，職專文憑缺乏升學階梯，修讀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或學校/業界結構提供的文憑課程，不能直接升讀學士學位；職專國際文憑課程成效有待觀察。

據團結香港基金資料，在OECD經濟體中，畢業於應用/職業型課程的高中生平均佔比為42%，但香港只有12%（圖一）。在芬蘭及德國，高中實行職業與學術並列體制，學生完成初中課程後，可選擇升讀職業型或學術型高中，畢業後可升讀普通大學或應用科技大學。根據德國聯邦數據統計，在2018至2019年，德國共有426所高等教育機構，其中216所是應用科技大學，106所是綜合型大學。當地應用科技大學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出現，在工程、經濟、社會及資訊科技領域提供應用型高等教育，以培養相關的應用型專才。

反觀香港，政府在發展基礎教育時仍抱着傳統的精英思維，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低估了應用型教育在整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令整個應用型教育的系統發展滯後於學術型教育。整個基礎教育雖有「多元學科」之名，卻難行「因材施教」之實。李曉迎嘆道：「家長普遍會認為孩子還是選擇學術科比較好，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適合學術科呢？」更重要的是，此事不止關於青年的多元出路，更關乎城市發展。應用學科升學渠道阻塞，令科技型人才產出效率大減，香港在未來以科技為核心的經濟競爭只會顯得滯後和被動。

《香港01》曾倡議政府應考慮主流中學以外重辦高級別職專高中。香港中學教育以前有「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之分，其中後兩者是為了培育具備工業知識與技能的年輕人。基於時代轉變，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課程被視為陳舊過時，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許相關學校刪除校名中「職業先修」和「工業中學」字眼，隨着時間過去，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最終合流。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死因」在於課程不合時宜，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讓課程切合時代需要。現在政府希望在創科方面大展拳腳，課程自應以此為設計及投資依據，包括推廣其他高端服務業的價值所在，改變市民的固有認識，培育適合新時代的高技術創新服務人才。

## 2.傳統產業抑制新興人才需求

「以前你拿着香港大學的『沙紙』（畢業證書），就幾乎『贏晒』！」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歎道，「以前大學生只有那麼少，現在卻不是了。」過去的香港，擁有大學學歷意味着擁有高薪厚職；但現在的香港，大學畢業未必能找到好工作，就算找到，亦未必有滿意的薪酬。如果以普通的市場思維來理解，這個現象會被歸因為大學普及率提高而帶來的「學歷貶值」。尚且不論香港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並不高，在人均教育水平高企的發達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亦不會出現如香港這般奇怪的現象。那香港的癥結究竟在哪裏？讀書、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投資為何不能在香港彰顯價值？

### 人力短缺源自供求錯配

提供高等教育被社會理解為對適齡青年的人力資本投資。每位入讀公立院校的青年，完成一個四年制學位需將近20萬元學費，而政府會資助超過80萬元。政府和家庭投入近百萬元，當然希望提升青年的專業知識水平，希望他們未來對社會有所貢獻。

但事實是如何？數據告訴我們，原來近百萬元的投入並不能帶來明顯的薪酬增幅，甚至不能帶來應許的職業。據香港統計處數字，2020年9至11月，擁有專上學位的失業人數為6.1萬人，佔總體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據2016年中期人口調查，擁有學位的人士收入中位數為1.2萬元，與高中畢業人士收入中位數僅差兩千元，而副學位課程的收入中位數為一萬元，與高中畢業無異（表四）。

學歷貶值還是讀書無用？事實並非那麼簡單。這種人力資本無法在勞動市場變現的現象，歸根結柢源自於香港的勞動市場供求錯配。這種供求錯配可以分為兩種現象：一是薪酬結構上的不公，二是職位需求的單一化。兩種現象歸根結柢又都是由傳統經濟主導的產業結構造成的。

這種結構性矛盾帶來的後果就是教育系統與人力市場的錯位，導致創新經濟中最需要的中層科技人才嚴重短缺。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鄧希煒在該院近日發布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撰寫《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下稱《經濟轉型》）一文，指出本地大學生為求穩定

高薪選擇修讀醫科、法律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驅動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學，「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市場並無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 分配不公導致學歷貶值

從大環境來講，香港人的薪酬早已陷入了長期性的增長停滯。鄧希煒在《經濟轉型》一文中指出，雖然過去二十年，香港的人均GDP 增幅達89%，但同期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增幅僅得63%，而食品價格漲幅超過80%，住房開支卻增加306%。簡言之，過去二十年，雖然香港整體經濟蓬勃發展，但每個香港家庭到手、可支配的錢卻愈來愈少，在食和住上都備受壓力。

在普遍性收入增長停滯下，高等教育學位雖增加了畢業生的人力資本，卻難言在人力市場上帶來相匹配的實質薪酬增幅。據人口普查資料，高中、文憑/證書、副學位及學位課程的畢業生，在20至24歲組別的收入中位數僅有千餘元差別（圖二），顯示剛畢業的青年在「搵工」時，學歷差距無法帶來明顯薪酬差距。同時，青年總體的收入中位數看似隨城市發展而穩步上升，但與消費通脹相比，實質收入是下降了。25至29歲專上學位畢業的青年，2011至2016年的薪酬增幅為12%，而副學位畢業的青年，同期薪酬增幅為27%。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這五年間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增幅為26%，即五年過去，專上學位畢業青年的薪酬增幅無法追上通脹，而副學位畢業生的同期薪酬增幅亦僅僅超過通脹。

與整體、長期性的收入停滯形成對比的，是香港疫情前火箭般攀升的GDP，在2011至2016年間增長了52%。這不禁令人深思，港人創造的勞動價值去了哪裏？政府、家庭在人力資本的投入去了哪裏？為何薪酬不能反映這些投資的價值？原來，學歷貶值背後並非學位不值錢，而是整個薪酬分配結構都出現了問題。

## 薪酬不公箝制科創人才

究其原因，香港單一的產業結構削弱了初次分配（即薪酬）的公平性。鄧希煒在《經濟轉型》中分析道，「香港早已備受結構性經濟問題困擾，重點在於高度倚賴少數服務業。」四大支柱行業，亦即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約佔GDP60%。他縱觀1996至2016年整整二十年的收入中位數數據，評價道：「四大支柱行業之中，只有金融業錄得工資增長。其他三大支柱行業的工資中位數和增速表現，全部遜色得多，有時甚至錄得負增長。」亦即，香港這座城市過去產生的經濟價值，很大部份都流入了金融從業者的口袋中。

五年過去，金融獨大的情況依然沒有任何改變。大多數青年都選擇修讀商科，商科畢業生也盤踞着高薪行業。根據求職網站JobsDB發布的《2020年大專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起薪點最高的行業中，除排名第一的「醫療及製藥」及第九的「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是理工科畢業生的職業，其他幾乎都被「地產金融」或「專業服務」佔據（表五）。報告亦指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連續兩年成為整體受訪同學的就職首選，人數佔14%；其次為銀行業（8%）、廣告及公關及市場事務（6.4%）。教育（6.1%）與醫療及藥劑（5.8%）分列第四位與第五位。

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指出，薪酬及出路是學生「揀科」的重要原因，雖然政府大力鼓勵發展科創，但學生根本無誘因去讀相關學科，「我們沒有一個經濟結構去吸收擁有高科技知識的畢業生，所以同學都去讀金融經濟，覺得一定找得到工作。」以JobsDB統計的就業薪酬為例，修讀「資訊科技」學系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點為16,618元，雖略優於其他非專業行業，但對比醫療、紀律部隊、政務主任等的差距仍相當明顯，與投資銀行及管理實習生相比更是望塵莫及。為什麼薪酬差距那麼明顯？因為地產金融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地租成本壓縮人力成本的空間，令香港久久不能轉型發展多元產業，依然深陷於傳統經濟。

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及其衍生的薪酬分配不公問題，不止左右了年輕人的志向，更限制了香港的創新人才培養。雖然政府近年大力宣傳創科，鼓勵年輕人就讀資訊科技相關課程，而許多青年亦對科

學很感興趣，但最後選擇其作為大學主修甚至未來職業的學生並不多。據嶺南大學研究報告《培養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素養》調查及統計顯示，有過半數的中學生對科學及相關科目感興趣（圖三）。但2019/20學年的自資院校專上課程學生人數統計中，選讀資訊科技課程的學生約為商業及管理課程學生人數的十分之一（表六）。年輕人才如此集中於醫學、商科等傳統精英學科，很難令香港適應現時以科技為核心的知識型經濟的競爭。

### 產業錯配衍生「讀書無用」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預言，香港很快就會面臨研究人才短缺的問題：「科學家不是什麼都識的！研究是否『犀利』不是靠科學家本身，而是靠那些『助手』。」他口中的「助手」，就是入實驗室的學生，因為「一個實驗室可能只有一個教授，但有很多學生和研究員」，而這正是深圳現時大力吸引境外高校赴深辦學的原因。除了中文大學外，深圳已吸引了莫斯科大學、墨爾本大學等到當地辦學，就是為了發展科研、儲備本地人才。

反觀香港，投身科研事業的本地青年極少。據教資會數據，2019/20學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課程，亦即坊間所稱的「學術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數為6,864人，佔總學生人數82%，亦即香港本地的學術研究生不足1,400人。由此可見，香港的科研投入大多流向非本地人才，但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非本地生未必會有足夠誘因留在香港繼續發展，難以為本地科研發展貢獻智慧。

為什麼本地青年不願繼續深造？因為香港有種奇怪的現象——「讀書無用」。「你在街上賣烤紅薯，跟在實驗室搞原子彈都差不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李曉迎笑言，目前香港薪酬太過平行化，大學科研對青年欠吸引力，「你想想，建築工人一個月工資大概四萬多元，與大學講師工資差不多，那讀大學的意義在哪裏？」

來港讀研究生的非本地青年就算不留港就業，至少可回家鄉另謀高就。但本地青年讀完碩士、博士學位，若想在香港就業，就會發現人力市場並不能帶來與學位相匹配的職位。由於香港的產業結構依賴四大支柱產業，而這四個產業為傳統產業，對新興科研人才的需求不大，高學歷人士難以覓得能發揮才智的職位。

「那時候，我們很羨慕台灣的學生和新加坡的學生。」陳偉儀回憶出國留學的日子，道出大量香港科研人才外流的原因：「不是說不想回流，是想回都回不來。當時台灣搞新竹（科學園），新加坡搞科技園，而香港對搞科研真的很冷淡。」他憶起在美國讀書的日子道：「讀完數理化，他們可回台灣、回新加坡發展。我們回港都是教書，回來幹什麼？」

陳偉儀講的是數十年前的事，但香港至今仍沒太大改變。政府雖將發展創科掛在嘴邊，但對科研的投入依然落後於平均水平。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所撰的《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下稱《建議》）寫道，「教育研究及發展的支出，香港更是大大落後，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的研發支出總和只及GDP的0.8%。相比之下，韓國和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中佔比均超過4.5%，瑞典、日本也在3%以上，而OECD成員國達2.4%的平均比率，則是香港的3倍。縱使特區政府近年擴大了研發投入，但差距仍然巨大。」

與此同時，傳統產業亦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加之政府的「小政府、大市場」思維，科技初創企業沒有生存空間。政府交由商界去運作經濟，忽視對市場的調控，卻不知商界根本沒誘因推動科技創新。陳偉儀解釋：「『有錢佬』投資搞科技的好少，因為科技的投資期比較長，其次就是他們對科技的認識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科技初創受限於地租和運營成本大量北流，能為科研人才提供合理薪酬的職位亦隨之流失。Workstem是一間在香港起家的科技型初創企業，主要向中小型企業提供人力資源的SaaS產品（Software as a Service，軟件服務），在深圳亦設有辦公室。Workstem營運總監蕭良琴接受《香港01》的訪問時坦言，「公司整個程式開發團隊都會放在深圳」，主要招聘資訊科技人才，而在香港

的辦公室更傾向於招聘顧問級人士和市場運營，因為「在香港招聘程式開發員，第一是價格比較貴，第二是人也沒那麼好招」，「據我所知，這在香港的創業公司是很common（常見）的，很多公司都會在深圳分設科技團隊。」

據政府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表七），2012到2017年的五年間，資訊及通訊業的人力需求僅增長一萬餘人，是高薪的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人力需求漲幅的三分之一。資訊及通訊業的人力需求佔比僅3.2%，與傳統產業如零售貿易業、商用服務業等相比，依然屬少數。

### 灣區就業未能標本兼治

政府當然不是沒意識到這個問題。本年度《施政報告》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於近期落地實施，計劃提供2,000個大灣區就業的政府資助名額，當中約700個為創科職位，鼓勵香港企業僱用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青年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月薪最低1.8萬元，政府會資助當中一萬元，為期18個月。

有心解難當然是好事，但政府的「就業計劃」似乎「治標不治本」。首先，青年於「大灣區就業」能解「失業率高漲」的一時之困，卻無助於產業結構的轉型。長遠來看，與高薪又「近水樓台」的金融與專業服務業相比，創科人才的就業出路依然沒有根本性的改善。其次，就業計劃沒有考慮異地就業的困境，吸引力成疑：以資訊科技人才為例，其平均起薪點為1.6萬元左右，毋須承擔住房成本和節假日交通成本；但參與計劃後，薪酬不過多了兩千元，卻要增添異地租房和交通成本。最後，計劃的名額過少，無法形成激勵性的前景：對DSE考生和準大專生而言，四年後才有資格參加的「就業計劃」，難言吸引，更不可能扭轉大學選科時偏好商科、專業科的風氣。

只依賴人力資源的流動，將科技人才短缺和青年就業的問題交由大灣區去解決，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更應看到本港深層次的產業結構問題，解決新興產業人才需求不足的問題。政府通過主動干預市場，為新興企業打造良好土壤，以此創造大量職位，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良策。鄧希煒在《經濟轉型》中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通過經濟誘因，吸引海外和內地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目標是轉移技術和知識，最終在港創造高科技職位，「可考慮以津貼本地勞動成本方式，鼓勵外來企業聘用香港人。有關政策旨在吸引外來企業，有助提高本地對科技人員的需求，從而解決人才荒，並在中期內有效提升科技及研究環境。」

除此之外，政府更應該從科研環境入手，為青年擘畫發展藍圖，才能真正激勵青年投身科技和科研，成為知識型經濟發展所需的核心生產力。現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各大學各學系的研究生收錄人數都設有固定名額，極大限制了培養研究型人才的效率。蔡洪濱在《建議》中提出：本港大學的博士生名額至少增加一倍；政府應建立「高級研究人才計劃」，為本港優秀大學畢業生往海外名校攻讀博士課程提供全額獎學金，訂立合理的回港服務要求，以便能持續不斷地培養本地高級研究人才。

### 3.港青北上創業重現活力

對城市而言，發展高增值知識型經濟必然需要新興企業。而新興企業的創業主力軍，應是充滿活力和才智的青年。然而，由於傳統經濟結構的限制，香港的創業成本極高，普通青年無法放膽嘗試；同時，大學作為集聚資源之地，亦是創意落地的重要孵化器，但政府精英思維下的行政主導，令高校在扶持學生創業時頻頻受挫。反觀內地高校，對於支持學生創業更為包容，資源運用亦更靈活。政府推出「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希望解創業之困，但傳統經濟結構一日不改變，精英思維一日不棄，創業人才恐怕難以留在香港，令經濟重現活力。

「在香港，『細個』談起我的志願，好多都是消防員、醫生、律師。」林思喬（阿喬）回憶道，「但在英國遇到的內地同學，很多是抱着Idea（創意）和想法，然後選擇回國落地『創業』。」阿

喬和羅德敬（阿敬）是兩位香港青年，在英國修讀商科後回港進入金融行業多年，如今卻合夥在廣東東莞市創立了自己的幼兒教育機構「寶寶與你國際教育」（Unibaby）。

## 離開傳統經濟創業沙漠

阿喬和阿敬讀商科，做金融，本已成為人人艷羨的上流精英，為何會選擇離開金融而涉獵別的行業？阿喬和阿敬不約而同地答道：「金融是『零和遊戲』（zero-sum game）。」阿敬解釋：「這個市場，如果是我賺錢，對面就虧錢，其實是無辦法創造一個價值出來的。」如今雖受疫情打擊，但阿敬並不覺得辛苦，「就算工作再累，對着小朋友，也會覺得和他們玩真的很開心！」

當然，他們是幸運的，早已通過教育和職業實現經濟上的「相對自由」，假想他們是「手停口停」的基層青年，就只能如阿喬開始所言，將目光定格在穩定、高薪、待遇良好的專業。本港生活成本極高，《經濟學人》智庫近日發表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2020》指出，香港在疫情之下依然力克一眾發達國家蟬聯榜首。在這情況下，青年為求溫飽早已營營役役，難言創業夢想。阿喬就說，香港的朋友圈中很少有如他們一樣的「創一代」，「很多都是接手爸爸公司的富二代朋友，又或者是打工的比較多。」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2018年發表的研究報告《香港年輕人的困境與機遇》曾與83位青年對談社會話題，當問及創業，大多數受訪者認為，「經濟與資產已被大企業及上一代的既得利益者所壟斷，佔據了經濟命脈、社會資源以至營商機會，餘下的創業空間已所剩無多」，「現行政策輔助大企業持續壟斷經濟，保障他們的生存空間和利益，扼殺了創業者與中小企業的營商空間，不少參與者（指受訪者）認為政府需要為此負上責任。」

阿敬坦言，創業之初曾比較香港與東莞的市場，先看價錢，「香港的playgroup（幼兒活動班）收費一小時可能收250元，但在深圳其實也有200元人民幣左右，價錢區別不大。」但如果看人力成本，香港與內地可能差兩到三，「內地請一個老師7,000元（人民幣），但香港沒有『萬幾元』是請不到的。」最後看地價，在內地找到有流量的地舖，租金比香港「便宜了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在內地創業是很有優勢的。」

面對偌大的市場，阿敬與阿喬的幼兒教育機構在東莞一開業就招收到近百名學生，已經做到收支平衡。而這一切，在香港卻無法複製。特區政府雖然口口聲聲把「教育行業」視為「六大優勢產業」之一，更聲稱要推動經濟多元發展，但一向「不干預」的態度，卻令香港成為地貴、人貴、利潤微薄的「創業沙漠」。

根據Startup Genome發布的《全球創業環境報告2020》（The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eport 2020），矽谷在綜合排名中毫無疑問蟬聯第一，而香港就排在全球第29位，不及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內地城市。排名從創業環境表現、創業資助、市場到達率、聯通度、知識水平、人才共六個方面進行評分，滿分為十分。香港在市場到達率方面表現最好，有七分，但在聯通度、知識水平、人才方面都只得一分（最低分）。

## 港校不及內地靈活包容

雖然香港創業環境惡劣，卻不代表這裏沒有創業需求。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就介紹了中大最新的創業扶持政策：深圳政府當年為研究院提供了一棟大樓作研究用途，但因教授都在港做研究，無奈荒廢掉了。2018年開始，中大將研究大樓30%的面積以成本價租給校友創業，又為校友提供法律、科研的援助。「這個創新中心裏面已經有四十二家中大畢業生創辦的創科企業。」陳偉儀嘆道，「而且還在『排緊隊』！」

其實，很多香港青年都有創業夢，卻因無法調動資源而被迫北上落地。陳偉儀分析，創業更依賴當地企業的投入和社會資源運用，但目前學校作為教育機構能做的始終有限，「因為UGC（大學資助

委員會)規定資助的錢只能用於香港的大學,所以我們不能拿錢去深圳幫忙的。整個創新中心是靠收租來維持運作。」

陳偉儀的一番話,折射出香港政府「行政主導」的僵化制度與傳統的「精英思維」,在推動創新創業時缺乏前瞻藍圖:創新人才培養歸大學資助委員會管,科研創新歸創新科技局管,創業資助又靠民政事務局撥款,而新興企業的落地就靠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公司等商界協作。

高等院校作為人才聚集之地,不僅是學生企業的孵化器,更是創意從象牙塔走向社會的重要過渡,如今卻受行政限制,無奈「戴着鐐銬跳舞」,只能實現部份人的創業夢。與其形成對比的,是內地大學裏濃厚的創業氛圍與豐富的創業資源。由學生創辦的小微企業如「雨後春筍」,為城市發展帶來無窮的活力。

蔡展鵬是一位香港基層青年,曾就讀於匯基書院,中學時期,假期會打零工幫補學費,家庭環境與大多青年無異。出於對攝影的愛好,他在學校開始研究虛擬實境(VR)技術,「覺得好有意思,可以全方位展示一個地點,但毫無死角!」在學校的支持下,蔡展鵬用了四個月的時間,拍攝了幾百張照片,並成功製作了一個匯基書院的VR全景地圖。

第一個作品過後,蔡展鵬覺得十分興奮,希望可以繼續探索,就自己用「生硬的英文」寫了一份計劃書交給香港科技園與數碼港。「第一次寫當然是不成熟啦,但我直接收到的feedback(回應)說是不通過,無funding(資助)。而且後續沒有任何支持。」蔡展鵬就直言,當時覺得很無助,「找不到人幫我。」

被拒絕後,蔡展鵬將眼光投向了內地,發現原來內地學校有不少機會。2014年,他選擇入讀位於廣州的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廣告系,並開始着手向學校尋求支持。蔡展鵬憶述,入學後,他第一次找系主任提出自己的想法,並展示了自己的作品,「他立刻介紹了兩個業界人士給我認識,好感動!」

後來,蔡展鵬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創新創業大賽,「同一份計劃書,我自己寫,但在暨大拿了國家級創新創業立項的基金,在香港就『也都無』!」他笑道,「有時選擇真是重要過努力!」計劃通過後,學校不止給了蔡展鵬三萬元人民幣作啟動資金,亦提供了辦公場地。在學校提供的豐厚資源下,蔡展鵬又拍了暨南大學、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及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的VR全景地圖。

畢業後,蔡展鵬憑藉過往成功的項目經驗在廣州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和工作室。他的公司多次承辦「廣東大學生廣告節」,將業界資源對接至學校,希望推動大灣區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他亦時不時與母校的廣告系互動,指導學生去韓國參加釜山國際廣告節等比賽。他更擁有一個小型的團隊,將文化創意融入餐飲業。訪問時,蔡展鵬突然叫暫停,因為要「落車搬貨」:「我們的餐廳『Eggy蛋料理食所』最近開到了長沙(湖南省會),所以比較忙。」

未夠30歲的他,如今真正成為有「獅子山精神」的活力青年。見他如今拼搏忙碌的樣子,記者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假如當初沒有去內地讀大學,可否想像自己在做什麼?蔡展鵬思考了一陣,答道:「可能會在香港考公務員吧!」

### 「青年創業計劃」再思考

蔡展鵬的故事猶如當代寓言,一句「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道出的是港青有志創業卻難覓資源的辛酸。不是說公務員這個職業不好,只是蔡展鵬選擇的創業道路,能為當地社會帶來更積極的影響,無論是個人層面的實現理想和價值、社會層面的創造就業崗位,還是城市層面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蔡展鵬展示了一個人才帶來的積極效應和無限可能性。

特首林鄭月娥在2020年《施政報告》更新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預計批出約一億元，為近200家青年初創企業提供資助，以及向約4,000名青年提供服務，鼓勵青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但糾纏於傳統行業長達幾十年的香港，其實比內地城市更需要創業人才和新興企業。與其推人北上，政府是否更應該考慮主動「干預市場」，為新興產業打造全方位的產業政策，就場地供給、資金資助、人才培訓等方面實現資源傾斜，令有志青年在香港創業時能背負少些社會壓力？政府又能否改變精英思維，革新管理制度，提高大學的自主權，令大學能夠成為學生創業的「溫室」，令資源調配更靈活，讓每個創意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回應？

## 精英思維主導 傳統經濟箝制 香港人才戰略困局



「當前人力資本狀況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遠遠未能滿足經濟轉型所需。」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該院近日發布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裏為香港敲響警鐘。

蔡洪濱筆下的「經濟轉型」，是指香港應該轉型至「以高端專業服務業為支柱，並由知識型創新驅動的新經濟」。在「知識型創新經濟」中，高技術、高知識的人才核心生產力，而坐擁優質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源的香港，人力資本水平本應很有競爭力，但為何會被詬病為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教育投入與人才產出之間如何錯位，才導致香港的經濟遲遲不能轉型，甚至屢失龍頭地位，只能搖頭興嘆？

有人把人力資本的滯後歸咎於學校未能作育英才；然而，只要將鏡頭對準香港青年，便可發現問題源於整個教育系統長期受困於兩道枷鎖：精英思維模式和傳統經濟結構。《香港01》與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李曉迎及一眾香港創業青年對話，冀能深入解構「人才荒」，為「經濟轉型」鋪路。（下轉A04）

楊澄瑋